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习近平时代》绪论（一）

□［美］熊 玠 主编

编者按：《习近平时代》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于2015年8月在美国纽约出版。全书以宏大篇幅，全面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从政经历和他提出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作出了正面回应。该书英文版登上美国亚马逊中国历史类第一名、全球政治领袖类第二名、亚洲政治类第三名，销量10多万册，是近年来在美国出版的销量最高的中国版权图书。该书主编熊玠（James C. Hsiung），1935年7月23日出生，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新闻系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中美关系和亚太政治研究领域资深专家。

征得该书出版公司和主编同意，本报对该书部分内容进行选载，请广大读者垂注。

被誉为“大道之源”的《周易》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要想观察时势、了解时代的演变规律，就应该从观察天道运行和人间万事万物着手。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要了解这个文明古国在新千年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最便捷的方法是从了解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习近平，自2012年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正在推动一个规模空前的改革进程。习近平将如何引导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又将如何带领中国与世界产生良性互动，答案就在他的宏大变革计划当中。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相似，习近平也正在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执政风格剧烈地改变着中国。

一、中国的新长征

1944年，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纽约时报》原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苏联遇见埃德加·斯诺，头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故事，于是开始着了魔似的，要把这个惊人的故事写出来。1972年，他作为全美作协主席率领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提出重走长征路线采访的要求，被拒绝。1984年3月，他与妻子再访中国，带病走完长征之路。1985年，他在美国出版了风靡全球的长篇纪实——《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在全世界再次引发中国的长征热。

长征，不仅是一个史诗般的行军故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励志图腾。每当国家遇到艰难困苦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总是喜欢朗诵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创作的诗句来激励国人。

2012年11月29日，就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参加公开政务活动的时候，习近平又一次引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著名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艰辛历程。

他说：“《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也就是在这次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公开阐述了他和中国人民共同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是这个民族近两个世纪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整体长征。

宇航员从浩瀚的太空俯瞰地球，发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蓝色星球，似乎一刻不停地在星空中孤独运转。如果拉近了镜头，跟踪着每天太阳升起的轨迹，第一片被照亮的大地就是亚欧大陆的东部。没错，位于东部偏南位置的大片土地就是中国的版图。这块大陆西高东低，广袤的土地孕育了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平坦地块，诞生了华夏文明。这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且五千多年来的文明史从未断绝，生生不息的人口汇聚成一个共同的民族——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如同众多支流汇成大河，组建了统一的国家。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版图和基本政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创造了众多繁荣之最的国家。但兴盛和危机总是交替进行，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坠入衰败的谷底。

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比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兴替有如此深沉而切身的感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繁荣，将奢侈推向一种极致，连续两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人，最有资格谈论繁盛、和平、安逸和文艺。“国土沦陷，水深火热”式的苦难，这里又曾是人间最苦的炼狱，仅1840年至1906年，中国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达700多种，中国的首都也多次沦陷。特别是近代日本法西斯制定了罪恶的“大东亚共荣计划”后，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族的空前危难，3500万人死于战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它的第一句歌词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如何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成为20世纪中国人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拯救中华民族悲惨命运、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就如同伟大的长征那样，曲折、悲壮，充满着牺牲，充满着英雄主义，又一路过关斩将，凯歌飞扬。

回溯中国20世纪中叶以来的民族奋斗史，中国经历了毛泽东革命时代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自主，建立了新中国，从此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上。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将中国带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总量进入全球前两名，将中国带入疾速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手上，中华民族离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接近。习近平将如何开创新的时代？在新长征路上他将抒写怎样的历史画卷，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二、毛泽东时代

晚年的毛泽东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实际上，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比这两件事丰富得多，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更有价值。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极少数领袖和哲人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对于毛泽东开创的建国大业和他的思想成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否定，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予以否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算起，到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为止，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为缔造美利坚合众国奋斗了14年，其中约8年的时间用于战争。

相比而论，毛泽东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就比华盛顿艰辛漫长得多。从1921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为之奋斗了28年，其中约22年投进血与火的战争当中。

与华盛顿建国付出较小的牺牲和较多的谈判不同，毛泽东在建国过程中，他和他的人民付出了极为巨大的牺牲，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殊死较量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争夺战争，一共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仅毛泽东自己的家族，就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与毛泽东在战场上交过手的对手很多，远远超过了拿破仑、华盛顿、汉尼拔、库图佐夫等任何一位西方军事家。毛泽东的对手中包括日本、美国、苏联、印度和以美国为首连同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19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军，当然还包括拥有800万之众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与美国、苏联、日本、印度等大块头都交过手且没有落败的军队统帅，全世界只能找到毛泽东这一位。

与军旅生涯出身并获得过上校军衔的华盛顿相比，毛泽东是纯正的农民出身，毕生喜爱读书和写作，只在一个非正规的部队里当过不到一年的兵，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教师。毛泽东很少穿军装，也很少摸枪，他习惯用自己的思想来进行领导。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谋略，也集中表现在他的文章和著作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流传极为广泛的名言，就出自毛泽东的文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概要地说出了新中国的诞生历程——这个新的国家是打出来的，是从血与火之中走过来的，也是无数人付出鲜血铸造出来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徽选择了同样鲜艳的红色。

毛泽东经常被誉为“游击战争之父”，殊不知他对现代战争特别是现代战略威慑，也有非常精深的造诣。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了核武器是一种常规武器无法比拟的威力极大、破坏性极强的武器。他针对美国、苏联等实施核威慑战略，根据世界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提出了在发展常规武器的同时还要发展尖端武器的主张。他认为，要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保卫国防，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建立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原子弹不仅是实施军事威慑与反威慑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个国家军事及综合实力的反映，没有核武器，就无法与国际敌对势力相抗衡，军事威慑与反威慑就会大打折扣。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着手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有关部门在当年就建立了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1960年2月，在苏联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协定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把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特别是尖端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基本建设规定为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项任务，提出要争取在3年内突破尖端技术这一关，并明确了今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在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下，应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而以导弹为第一，同时注意发展电子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极端困难，尖端武器的研制一度陷入困境。这时，一些人提出尖端武器的研制要下马。毛泽东明确地指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两次谈话中也都讨论了原子弹问题。

1964年10月，在国内许多优秀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同时，中近程导弹和远程导弹的研制也进展顺利。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6月，中国地对地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建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

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在很短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拥有了尖端武器，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还掌握了卫星和导弹技术，其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的自主防卫战略思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有效震慑了敌对势力的入侵，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

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对于开国的政治领袖来说，这又是一道无法绕开的难题。

《贞观政要》记载，公元7世纪初，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大臣们就此进行了一次专题辩论：

“究竟是创业艰难还是守业困难？”唐太宗向群臣咨询。

“当然是创业艰难，因为缔造国家需要流血、战争和残酷的厮杀，经常面临着生死考验。”众多大臣不假思索地回答。

但大臣魏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开国创业当然艰难，但那种生死考验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当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反而不容易犯错误。而守业就不同，它必然是漫长的枯燥的，更可怕的是时刻面临着腐化堕落的考验，领导者很容易在歌舞升平中丧失意志力，最后在意志消沉和政治腐败中丧失政权。

唐太宗表示很认可魏征的判断。

一生熟读历史著作的毛泽东对此段历史论辩自然谙熟于胸。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庞大而统一的政权开始运转，新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多方面的。在国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结成了同盟，但谁都知道，这种实力不对等的结盟是不稳固的。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退守到了台湾，美国与台湾地区很快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使蒋介石有可能反攻大陆。美国在远东朝鲜战场失利后，将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台湾打造成了一条新月形的遏制锁链。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对前任进行反攻倒算，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缝，苏联成为新中国北边的巨大威胁。苏联和英联邦的成员印度打得火热起来，印度迅疾成为中国在西南部的主要挑战者。看似“四面楚歌”，但毛泽东的内心中，对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国际包围遏制圈倒不是很畏惧，他在诗中自比傲雪的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心腹大患是魏征指出的政治家意志懈怠，进而言之，是政治家整体性的被腐朽生活方式腐蚀，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红色政权进行改旗易帜，使无产阶级丧失在政治上的绝对主导权。为了防止“赫鲁晓夫睡在身边”，也为了挖出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赫鲁晓夫”，保持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毛泽东毅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被证明是悲剧性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的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这样的语言为“文化大革命”盖棺论定：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份“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了结论，邓小平也从宏观上多次论述过。邓小平指出：“在这二十年（指1957—1978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惜中国失去2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跃然纸上。

历史的悲剧也是宝贵遗产

“当环境和条件改变时，领袖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他大概不适合带领这个国家进入另一个阶段。”不久前过世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晚年对媒体谈及毛泽东时，做出了这样深沉的慨叹。

没有人怀疑毛泽东要把中国带入富强道路的坚强决心，但现实却给这位历史巨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留下的是一个并不发达的中国。

固守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将斯大林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视为社会主义的标杆，对市场的恐惧和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不信任，历史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的真诚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能够将这场浩劫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的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打砸抢抄、造反夺权，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派一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均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防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那是无法计算的了。

历史的损失只有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才能弥补。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让人在感受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不能脱离这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政治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方向性、全局性的错误。特别是脱离实际，意欲凭借空想主义跑步建成富强中国的目标，被实践证明是绝无可能的。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深深刺痛了后来的中国政治家。